

# 增长理论向历史研究的回归<sup>\*</sup>

别朝霞 代谦

**内容提要:**增长理论在历经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两个历史阶段后,转向了对增长历史问题的关注。这一演变有着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牢牢把握住了增长中的技术因素;在理论上解决了技术的内生问题之后,新增长理论尝试解释历史上的增长问题。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技术本身也是内生演变的,受制于历史、文化、制度等更为核心的因素。增长理论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是超越技术去关注那些在更高层面上决定着长期增长的因素。增长理论发展的新动向或许标志着增长理论向历史研究的回归。

**关键词:**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

## 一、引言

对福祉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对增长问题的探索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增长理论不仅需要解释增长的现实,也需要解释增长的历史经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脉络,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在技术革命的引领下持续增长,增长理论的发展牢牢把握着技术革命这一核心。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触及技术这一根本因素,但是其外生技术假定这一理论缺陷限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增长事实的深入考察,“这一模型解释了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Barro & Sala-i-Martin, 1995)。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成功地将技术内生化,在内生技术框架下深入分析技术问题,深入探讨技术对长期增长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具体机制(Aghion & Howitt, 1999)。

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阶段中,新增长理论从各个方面解释现实的增长。例如,有的从创新模式角度解释增长(Romer, 1990; Grossman & Helpman, 1991),有的从内生生育的角度解释增长(Becker & Barro, 1988; Lucas, 2002),有的从开放经济的角度解释增长(Brezis, Krugman & Tsiddon, 1993),有的从

政府行为角度解释增长(Barro, 1990; Barro & Sala-i-Martin, 1992),有的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解释增长(Kongsamut et al, 2001),有的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角度解释增长(Barro, 2001)等等。相关文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一方面,这些理论都遵从共同的理论内核——收益递增(Romer, 1986, 1990; Lucas, 1988),另一方面,这些文献都紧扣人类的增长现实,紧扣技术进步的主题。这也为新增长理论之后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逻辑严密的理论基础。

随着理论的演进,增长理论尝试解释人类历史的长期增长,将对增长现实的解释和增长历史的解释贯穿起来。这一发展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成功的增长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增长的现实,更应该能够解释增长的历史,解释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增长历史阶段之间的演变和转换。增长理论对增长历史的关注也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1)利用新增长理论成熟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向历史纵深扩展,例如新增长理论对工业革命的探讨,对马尔萨斯增长模式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一方面体现了增长理论的历史厚重感,另一方面也是新增长理论演进本身的逻辑要求。(2)超越以往对技术问题的研究框架,讨论历史冲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的增长效应。虽然技术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长期增长的核心,但是技术本身也是内生演变的,并不是增长

<sup>\*</sup> 别朝霞,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0,电子邮箱:351909978@qq.com;代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daiqianecon@xmu.edu.cn。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7117316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901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61415002)。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的终极原因,它更多地受到历史冲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技术来说,这些因素更为本质,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决定着技术的演进,决定着增长的效应。增长理论近些年的发展,完全超越了新增长理论内生技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更深刻、更具体的层面上探讨历史因素的增长效应。

## 二、缘起:新增长理论对历史增长的关注

增长经济学家们对增长历史的关注首先会注意到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转折。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停滞是社会常态;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好像进入了“增长通道”,技术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便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摧残和冷战的阻碍,增长势头依然不减。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抓住了技术这一核心因素,但是外生技术的设定限制了新古典理论对技术因素的进一步研究,这也促成了增长理论对技术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革命的深入探讨。

Lucas(2002)认为,漫长的人类历史不乏蒸汽机这样的技术变革(例如,火的使用、轮子的发明等),但是只有蒸汽机的发明诱发了后续一连串的技术变革,引起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其他的技术变革却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工业革命期间一定发生了其他历史阶段所没有发生的事情。Lucas(2002)认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以往的技术变革刺激了人口增长,增长的人口抵消了收入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如果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辅之以人口增长的下降,人均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Lucas(2002)将研究重点放在“人”身上。他借鉴了Becker等人的内生生育理论(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 Becker, Philipson & Soares, 1990)来解释人口转型问题。利他主义的父母面临子女数量—质量的权衡,在经济中技术水平较高的时候,父母倾向于少生育,多进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用子女质量来代替子女数量。在这一机制下,人口转型得以发生。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带来了人口增长的下降,从而引起了人均收入的提高。

Galor & Weil(2000)沿着人口转型的思路,进

一步对历史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马尔萨斯模式(Malthusian Regime)、后马尔萨斯模式(Post-Malthusian Regime)以及现代增长模式(Modern Growth Regime)。在马尔萨斯模式中,停滞是常态,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任何技术进步仅仅只是带来人口的增长而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后马尔萨斯模式中,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口在经历了初期的增长之后开始下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而这正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经历;在现代增长阶段,技术与人均收入稳定持续增长,人口增长逐步下降甚至趋于停滞。

Galor & Weil(2000)认为,人口转型有自己发生的时间点,只有当外在的技术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父母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才变得合算,人口转型才有可能发生。此外,在技术落后的前工业社会,人类没有能力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只有当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家庭的最优选择,并且家庭也有能力去实现这种最优行为时,人力资本水平才会提高,从而才有可能激发社会中一连串的技术变革,人均收入在技术进步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持续提高。这一研究框架完全内生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统一解释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增长,为后来“统一增长理论”(Galor, 2005)的源头。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个技术进步、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过程。Hasen & Prescott(2002)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问题。实际上,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在他们的模型中,农业部门投入土地和劳动力,使用边际报酬递减的“马尔萨斯技术”;而工业部门则利用资本和劳动力作为投入,摆脱了固定要素“土地”的束缚,采用常规模报酬的“索洛技术”。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个体自主投资选择的结果。当经济中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投资于工业部门变得具有吸引力,人们开始逐步投资于工业部门,积累工业资本,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投资工业部门的吸引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下去,资本、劳动力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聚集,工业化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个工业化过程并不是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的,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农业部门向现代农业进步的过程(Gollin et al, 2002)。

### 三、超越技术：对历史增长的研究

观察人类历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只是历史的片段。图 1 描绘了人类社会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增长：在前面的 1800 年（公元元年—公元 1800 年），人类社会增长非常缓慢（在前 1000 年，人类社会几乎没有增长），增长的转折发生在 1800 年前后；1800 年之后的人类社会，经济加速增长，至今保持了两百年。增长理论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类历史的长期增长。对历史增长的反思是增长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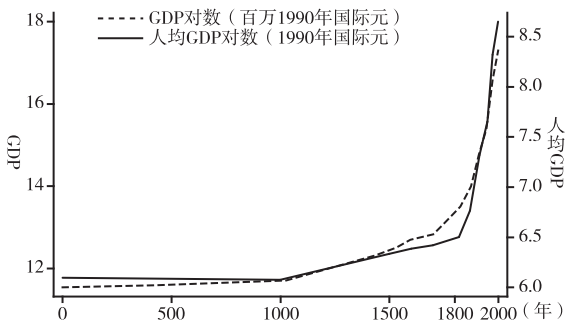


图 1 人类增长历史

资料来源：麦迪逊(2003)，pp. 262—272。

早年的文献一般将人类的增长历史划分为几个大阶段，用一个统一的增长理论来解释。具体地说，增长理论家们往往从人口转型的角度切入研究，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特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增长特征(Galor, 2005; Galor & Weil, 2000)。但是，人类社会千差万别，条件各异，根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增长模式来囊括。因此，增长理论家又发展了多重均衡模型应对这种多样性(Galor, 2007; Galor & Moav, 2002)。然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并非随机产生，各种千差万别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试图找到这些决定因素，弄清楚它们的影响机制。

鉴于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增长理论家们基本上放弃了对统一理论框架的探索和构建，更多地探讨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后果与影响机制。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远远不是简单的增长模型能够囊括；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事件的多种多样，文献的研究也呈现多样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的回顾存在着“挂一漏万”的可能，这里仅仅对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

#### (一) 历史经验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社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不变的人性决定着不同的个体和集体在相同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人类会向类似的方向演进。观察人类历史，历史不断在自我重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就决定人类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学习。相对于笼统讨论制度、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Landes, 2003)，经济学家们更关注具体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一支文献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特征。经济学家往往研究某一具体事件长期或短期历史的影响，在增加对历史演变认识的同时，推动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非洲向各个大陆迁移扩散。虽然各地的人们同宗同源，但如今各国却发展各异。Ashraf & Galor(2013)研究了人类在从非洲起源地向外迁徙中，人类基因多样性对当地发展的影响。基因不同意味着不同的种族、群体和文化习俗，意味着彼此认同感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洲为什么部族冲突不断，种族仇杀不绝。Alesina et al(2013)研究了犁的引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犁的引入强化了男性的力量优势，开始改变人类社会性别角色对比。换言之，当人类社会转入农耕文明的时候，社会性别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欧洲的经验让人瞩目，经济学家的研究从许多方面展开。瘟疫、战争和城市化在欧洲早期的发展中至关重要(Voigtlander & Voth, 2013)。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瘟疫（例如黑死病）的爆发具有某种历史偶然性，但是瘟疫的传播和欧洲各国紧密的联系、商队的穿梭、军队的调动有关；欧洲的城市化和美洲高产作物的引入有着紧密的联系(Nunn & Qian, 2011)；战争则和欧洲传统的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这些都使得欧洲开始摆脱马尔萨斯循环，整个社会开始迈进新的模式(Gennaioli & Voth, 2009)。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英国毕竟孤悬海外，对欧洲大陆缺乏直接影响；对欧洲大陆国家有直接影响的是法国和德国。Acemoglu, Cantoni et al(2011)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疾风暴雨的法国大革命对君主制盛行的欧陆其他国家来说完全是外生的制度变革；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四处扩张，无意中也造成了被占领地区强制性的制度改变；这种制度变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即便在拿破仑失败之后，各国君主重回故地，整个欧洲大陆仍然朝着新的制度方向演变。

Redding & Sturm(2008)则研究了德国分裂和重新统一对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的影响。

不仅欧洲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非常普遍的现象。Bleakley & Lin(2012)以美国的港口城市为例研究了美国城市发展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美国早期很多城市都是水道货运枢纽,当水运衰落之后,以前的港口城市并没有衰落下去,反倒继续发展成为重要的大城市。Hornbeck(2010)以19世纪美国中部大平原“铁丝网”的引入为例,探讨了产权制度对美国中部平原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木头栅栏和石头栅栏,“铁丝网”提供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农田产权保护方式。农田产权保护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Hornbeck(2012)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刻画了美国经济(例如产业结构、人口流动等)在其中所受到的冲击以及经济在短期和长期中所进行的调整。当时的调整模式和现代经济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完全一样。

## (二)殖民时代的遗产

和欧洲兴起相伴的是殖民扩张和血腥的奴隶贸易,对殖民时代的反思也是近些年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Acemoglu et al(2001)考察了殖民者的制度遗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美洲、非洲以及很多亚洲国家历史上都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但是今天这些国家发展迥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革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其他国家却长期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他们认为,各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它们的制度(如对政府专断权力的约束、独立的司法、产权制度、教育平等);当前的制度受制于其早年殖民地时代的制度遗产;而殖民地时代的制度遗产取决于当年殖民者的殖民政策:是采取掠夺政策而源源不断地将殖民地财富转移到宗主国,还是按照宗主国的制度模式长期经营殖民地。当时的殖民条件左右着殖民政策的选择。殖民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殖民者的死亡率。如果殖民地的死亡率很高,殖民者一般不会采取长期经营的殖民政策,而以掠夺式经营为主;如果殖民地适合殖民者长期居住,则殖民者会做长期经营的打算。他们的计量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早年的殖民条件决定的殖民政策对于今天的制度模式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殖民经历对殖民地国家影响复杂,不能笼统论之。Acemoglu et al(2001)的研究展示了殖民经历

对新大陆殖民地国家影响的复杂性;而Feyrer & Sacerdote(2009)利用岛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殖民经历对殖民地发展具有正向影响;Jia(2014)利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数据,验证了西方国家殖民活动对通商口岸发展的正向效应。大相径庭的结论进一步表现了殖民经历影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Bruhn & Gallego(2012)进一步指出,殖民历史对殖民地的影响取决于殖民者当年的所作所为。如果当年殖民者只是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攫取当地的资源(例如开矿、庄园种植等),建立“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殖民历史必然对殖民地产生负向影响;只有当殖民者打算长期经营殖民地,复制和完善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殖民历史就会对当地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Banerjee & Iyer(2005)研究了殖民时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土地占有制度对地区长期发展的影响。在印度的不同地区,英国殖民者推行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Iyer, 2010):在某些地区,英国殖民者直接占有土地,直接获得土地收益;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英国殖民者通过当地的地主间接控制土地。土地占有方式的不同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发展;具体来说,英国直接占有土地的地方有着更高的健康水平、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好的农业投资。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对自己直接控制的地方有着更多的正向影响。实际上,当年来自于殖民者的制度遗产往往成为后进国家的模仿典范。这也支撑着Bruhn & Gallego(2012)的观点:殖民经历的效应取决于殖民者当年的所作所为。

和西方殖民行为相伴随是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对输出奴隶的非洲来说是一场灾难,其影响持续至今,出口奴隶越多的地区,其长期发展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Nunn, 2008);值得注意的是,奴隶贸易对不同的欧洲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年的西班牙、葡萄牙从大西洋贸易(主要是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好处远远大于英法,但是工业革命却发生在比他们条件更差的英国。在英法崛起之后,西葡两国也是风光不再。Acemoglu et al(2005)认为,只有当大西洋贸易与西欧国家的内在制度形成良性互动之后才能促发工业革命。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各国王室专制权的强弱。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专制王权的国家,王室和与王室有着紧密联系的特权阶层完全垄断了大西洋贸易,从大西洋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又进一步加强了王室的专制和特权。这样,贸易所带来

的经济利益无法普惠大众,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社会结构趋于僵化,商人阶级也无从产生,商业化的发明创新也无从谈起。反观英国,王权在传统上就受到议会很大的限制,“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成为基本的政治制度,王室无力垄断各种商业机会,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得以普惠大众,商人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能对经济机会做出充分的反应。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蓬勃开展且不断积累,最终促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 (三) 制度遗产

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在 North(1981)开拓性研究之后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制度本身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同时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深远影响(Acemoglu et al, 2006),显然文献对制度问题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早年的笼统抽象讨论,而转向探究具体制度内容的影响。

Puga & Treffer(2014)研究了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兴衰。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地中海是欧洲贸易的核心,其中的威尼斯为核心中的核心。但是最初的新兴贵族通过海外贸易攫取财富、控制威尼斯政治之后,却开始垄断威尼斯政治、阻塞下层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固化社会阶层。僵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威尼斯错过了大西洋贸易兴起、工业革命开展等历史机遇,在历史竞争中落后了。Dell(2010)研究了秘鲁当年的奴隶制度对当今发展的影响。南美洲矿藏资源丰富,强制劳动的奴隶制度在南美的矿山流行。当今南美国家的种种乱象总能够找到当年奴隶制度的影子,当今南美发展的失败和其制度的失败紧密相关。

Acemoglu et al(2002)研究了“财富的逆转”背后的制度问题。目前那些发展较差的地区在1500年“大分流”时代之前往往发展领先,而那些现在发展较好的地区,在“大分流”时代之前往往发展落后。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财富的逆转”?这一现象背后是“制度的逆转”。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国家为新时代的崛起做了相当多的制度准备:城市兴起、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等重大变革冲击层出不穷,“工业革命”只是这些制度大变革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反观那些早年的领先者,由于旧有制度在前期发展中取得了相对的成功,社会无法尝试新的制度框架,仅仅在旧有的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一旦西方社会借助“工业革命”四处扩张,这些早年的领先者被远远抛在后面。

Besley & Burgess(2000)研究印度独立之后的

土地制度改革与其反贫困的关系。独立之后,印度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其目标在于取消中间人地主,增加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相关的贫困。然而,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施行的效果并不一样,其原因是不同地方千差万别的制度环境。Bernhofen & Brown(2005)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外开放对日本贸易利得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打破幕府时代的闭关自守,在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贸易利得。Hayashi & Prescott(2008)更进一步研究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产业结构变化之中制度传统的影响。日本是典型的东亚文化,家庭生活中“家长制”盛行,“子承父业”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种制度传统,阻碍了当时日本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制度本身具有内生性,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由于制度内涵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尝试在一般化层次上去剖析制度(Acemoglu & Johnson, 2005);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个人信仰、宗教观念、文化传统等角度探讨具体制度的影响。

### (四) 社会结构

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外生冲击多种多样,有些冲击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人们往往在与世隔绝的岛屿、沙漠、原始深林中发现文明退化、技术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始文明或其遗迹(Henrich et al, 2001),人们推测这些地方可能因为某些外生的自然冲击而发生文明发展的逆转(例如海平面的突然升高导致原先和大陆相连的陆地成为与大陆隔绝的孤岛,这样的冲击导致了当地发展的剧变)。Chaney(2013)利用埃及的尼罗河泛滥数据,验证了自然冲击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当时的埃及,精神的宗教权力和世俗的军事权力是分离的。尼罗河的泛滥使农业生产受损,粮食价格上涨,增加了社会动乱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宗教在稳定社会、解决社会危机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这在无形中增强了宗教领袖的力量。统计结果表明,在尼罗河泛滥时期,宗教领袖被罢黜、流放的概率都大大减小。自然的冲击影响着埃及的宗教与军事力量的消长,影响着埃及的政治结构。

外生冲击为经济学家们识别其中具体的制度传导机制提供了机会。如果外生冲击能够深入改变社会结构,那么外生冲击将造成深远的影响。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相关城市的轰炸(Davis & Weinstein, 2008),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对越南相关城市的

轰炸(Miguel & Roland, 2011),都造成了相关城市的满目疮痍。但是,天空上的轰炸并没有深入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在经历一两代人之后,这些当年遭受轰炸、满目疮痍的地区又重新恢复了战前的繁荣。Acemoglu, Hassan et al(2011)研究了纳粹德国对某些前苏联占领区实行大屠杀的影响。纳粹德国的屠杀虽然是针对犹太人,但是这种大屠杀却使得当地损失了相当的精英人口,完全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大屠杀的影响持续至今,那些遭受过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地区直到今日(如在苏联解体之后),其经济与政治表现也较差。又如,东德、西德同文同种,由于历史的偶然变成两个国家,东德、西德甚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战前,德国的航空中心在柏林,分裂之后,航空枢纽转移到法兰克福。这种变化是根本而不可逆转的,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航空中心再也没有能够回复到柏林(Redding et al, 2011)。航空中心的变化只是东西德演变一个小小的方面,东西德的发展落差体现在经济的方方面面。无独有偶,朝鲜和韩国的发展迥异更让人感叹。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了“昙花一现”的外生冲击产生持续影响的具体机制。Nunn & Wantchekon(2011)以非洲的奴隶贸易为例,探讨了外生冲击长期影响的机制。非洲奴隶贸易早已经彻底结束,距离其巅峰时期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洲国家早就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非洲大陆仍然经济发展停滞,部族宗教冲突不断。当年的奴隶贸易往往利用黑人之间的矛盾来捕获黑奴,增加了部族之间、家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通过宗教、文化、传统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一种历史印记。如果单方面取消某些制度,而不去关注与之相配合的社会结构,那么这种改变也很难成功。例如,在中国的晚清,政府强令取消“科举制”(1905年),而不去关注“科举制”背后的社会结构,强行阻断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社会陷于混乱的境地(Bai & Jia, 2015)。

### (五)“文化”黑箱

个人信仰、宗教观念、文化传统综合为“文化”因素。无疑,文化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并最终在增长层面上体现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Fernández(2011)对文化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梳理,文化影响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劳动市场规则、再分配和金融发展等经济的方方面面。Giavazzi et al(2013)则发现了长期以来 OECD 国家里对性别、年轻人和闲暇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对女性就业率和人

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文化”内涵复杂,学界定义繁多。可以肯定的是,在集体层面,文化是集体的信仰、社会规范;在个体层面,它涵盖个体的信仰和偏好。这种信仰和偏好往往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通常其变化比较缓慢(Aghion & Howitt, 2008)。此外,各民族、各国家发展历史和发展态势迥异,也影响各地的文化。

作为文化重要内容的宗教,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Guiso et al(2003)认为宗教信仰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合作、政府、法律规则、节俭、市场经济等事情的经济态度,这种态度通过父辈对子女的影响而不断传承从而形成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基督教更有利于社会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态度。例如,不同宗教对节俭有着不同的认识传统。那些传递节约观念给孩子们的人们所占比重越大的国家,其储蓄率和增长率相对较高,这也能够为跨国储蓄率存在巨大差异提供文化方面的解释。

信任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Guiso et al(2003), Knack & Zak(2001)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信任和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也较高;极度不信任的地区通常会落入贫穷陷阱。Tabellini(2010)认为文化表现为信任和对其他人的尊重,对个人决策的认同。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用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度量文化验证了文化对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人均 GDP 和增长越高的地区,“好”的文化水平也就越高,即高水平的信任、对个人决策的认同、高的道德水平和对权威的盲从(Alesina & Glaeser, 2004)。

文化也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方面,不同文化传统的个人和群体对相同的政府政策抱有不同的观念和认识,从而影响着政府政策的效果。例如,不同的宗教和非宗教团体对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有着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影响着政府的反贫困政策(Alesina & Glaeser, 2004)。另一方面,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选择糟糕的公共政策?Easterly & Levine(1997)发现,民族多样化是理解跨国公共政策差异的重要因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伴随着政治不稳定、教育水平低下、金融体制落后、外汇市场扭曲、政府高赤字和基础设施欠缺等特点,高度分离的种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有着不同的认同感,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无法选择和执行好的公共政策。

进一步地,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2014)

研究了文化与制度对非洲地区发展的作用。非洲地区种族繁多,种族文化纷繁芜杂。同一个国家会包含很多种族,同一个种族的人也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国家同一种族的人,即便面临不同的国家制度,但是却面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也面临相类似的地理条件。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他们以非洲独立之前因为政治边界毗邻而居、却属于不同国家的超过 200 多个种族的经济表现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制度的差异并没有对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种族的经济表现出任何系统性影响。在同一种族内,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文化在种族群体中代际传递且根深蒂固,对经济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Guiso et al(2003, 2004)利用意大利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人们的行为更多受到其出生地的社会资本影响,移民出生地的文化对移民的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移民离开了出生地之后依然存在。

文化因素往往隐藏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背后(Alesina & Giuliano, 2015),所以在研究层面,学者们很难将文化因素从制度因素中分离。Fernández(2011)利用移民群体样本从制度中分离出文化因素。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群体在当地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但是移民群体往往聚集生活,保持着自己的家乡文化和习俗。利用移民数据,经济学家就将文化从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这一识别思路与 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2014)从种族层面考察文化作用的思路异曲同工。

Doepke & Zilibotti(2008)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中不同阶层文化的作用。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于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代替了地主成了社会中的主要力量。这一主导阶层转变的背后是社会主导阶层代表的文化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富人靠收取租金度日并发展出了喜欢闲暇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从事需要依靠自身努力、技能和经验的工作,发展出了忍耐和职业道德两种类型的文化价值。这一文化的转变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传承下来,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 (六)人力资本

增长的核心是人,历史中人力资本的因素和长期增长紧密相关。近年来文献对人力资本的探讨远远超过了 Lucas(1988)当年对人力资本因素的探讨。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口因素的考察,有两个层面的问题:(1)人口数量对增长的影响;(2)人力资本的

增长效应。对东西方人口增长历史的观察,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东西方人口增长率的不同。根据人口学家的估算,前一个千年(公元元年至公元 1000 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 1‰;后一个千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1‰(葛剑雄,2001);这一数值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人的高生育率背后是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往往以宗族为单位集聚居住,子代受到宗族和家族的资助,往往很早成家而开始家庭生活;而西方人在没有稳定的收入之前,却多半不会选择家庭的生活负担。韦伯(2010)从基督教文明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社会的低生育率问题。Voigtlander & Voth(2013)则认为欧洲的战争、瘟疫、城市化降低了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使得欧洲世界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人们的创新和人口规模紧密相关(Jones & Vollrath, 2013),人们的随机接触不仅能够增加创新的概率,也加快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Lucas, 2009)。显然,人口规模可以使得经济获得相关的创新优势,这可以解释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传统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领先。但是这种优势在西方的科学实验制度兴起之后便不复存在,科学家在实验室短时间内有目的的试验次数超过了传统中国一个工匠一生随机摸索的总和(Lin, 1995)。同时,明清专制而封闭的制度也阻碍了创新的产生,更没有能够像欧洲那样发展出完整地鼓励创新的产权专利制度。

Galor et al(2009)研究了各国近代化历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历史竞争,幸存的农耕文明站在近代化的门槛之上。更平均的土地占有意味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和普通农民收入的提高,普通农民能够有能力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这样就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此外,在一个地权相对均等的社会中,社会更容易建立各种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如公共学校体系)。而这些制度,都支撑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Cantoni & Yuchtman(2014)研究了欧洲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商业发展中的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中世纪大学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为城市、手工业、商业培养了大量能写会算的人才。由于商业的发展涉及大量的商业关系,中世纪大学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中世纪大学的毕业生摸索出很多和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规则和商业制度。Becker & Woessmann

(2009)研究了“宗教改革”的长期影响。“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系统对宗教的垄断,普通教众可以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成为“上帝”的信徒。这一运动产生了一个效应,号召大家都来读《圣经》,无形中提高了社会中的识字率,为欧洲的经济起飞提供了人力资本的支持。

具体地,Squicciarini & Voigtlander(2015)区分了人力资本中知识精英和一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18世纪法国为例,探讨了知识精英对法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他们利用当时的“百科全书”的订阅数据来代理知识精英的分布。一般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具体的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的收入,但是在技术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知识精英作用更加明显,能够使得企业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推动企业采取新的技术。知识精英对企业、城市、国家来说,更具有一种增长效应。

#### 四、结束语

增长的现实和历史一直推动着增长理论的发展,增长理论本身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着增长的现实和历史以及对增长问题思索的深化。当历史增长问题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时,经济学家的研究异彩纷呈。然而相关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历史冲击、大分流、殖民遗产、制度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等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或许标志着增长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合流。它们都在解释一个共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决定或阻碍着发展,“天下大同”是这个世界的归宿吗?Lucas(2000)对此满怀信心,他认为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从英国扩散到法国、美国、德国,传播到俄国、日本,又波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随着扩散范围的扩大,相关国家开始搭上增长的列车,进入增长通道,这种扩散直到今天还远没有结束。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增长的扩散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各国具体背景条件、国情千差万别,这些偶然性必然决定经济增长有先有后,那些加入增长俱乐部的国家自然会拉大与那些未加入增长俱乐部国家的差距。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收敛是绝对的;而对于世界各国增长的发散(divergence)问题,如Lucas(2002)所说,收入不平等伴随着工业革命扩散所带来的好处在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

#### 参考文献:

葛剑雄,200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麦迪逊,2003:《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韦伯,2010:《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Acemoglu, D., S. Johnson & J. A. Robinson(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1369—1401.

Acemoglu, D., S. Johnson & J. A. Robinson(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231—1294.

Acemoglu, D. & S. Johnson(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5):949—995.

Acemoglu, D., S. Johnson & J. A. Robinson(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546—579.

Acemoglu, D., S. Johnson & J. A. Robinson(2006),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in: P. Aghion & S. N. Durlauf(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Acemoglu, D., T. A. Hassan & J. A. Robinson(2011),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2):895—946.

Acemoglu, D., D. Cantoni, S. Johnson & J. A. Robinson(2011),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3286—3307.

Aghion, P. & P. Howitt(1999),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Aghion, P. & P. Howitt(2008),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MIT Press.

Alesina, A. & P. Giuliano(201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53(4):898—944.

Alesina, A. & E. L. Glaeser(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sina, A. et al(2013),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2):155—194.

Ashraf, Q. & O. Galor(2013),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1—46.

Bai, Y. & R. Jia(2015),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Econometrica* 84(2):677—733.

Banerjee, A. & L. Iyer(2005),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1190—1213.

Barro, R. J.(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S103–S125.
- Barro, R. J. (2001),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12–17.
- Barro, R. J. & X. Sala-i-Martin(1992),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4): 645–661.
- Barro, R. J. & X. Sala-i-Martin(1995),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 Becker, G. S. & R. J. Barro(1988),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3):1–25
- Becker, G. S. , K. M. Murphy & R. Tamura(1990),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S12–S37.
- Becker, G. S. , T. J. Philipson & R. R. Soares(1990),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77–291.
- Becker, S. O. & L. Woessmann(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531–596.
- Bernhofen, D. M. & J. C. Brown(200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25.
- Besley, T. & R. Burgess(2000), “Land reform,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2):389–430.
- Bleakley, H. & J. Lin(2012), “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2):587–644.
- Brezis, E. S. , P. R. Krugman & D. Tsiddon(1993),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211–1219.
- Bruhn, M. & F. A. Gallego(2012), “Good, bad, and ugly colonial activities: Do they mat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2):433–461.
- Cantoni, D. & N. Yuchtman(2014), “Medieval universitie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823–887.
- Chaney, E. (2013), “Revolt on the Nile: Economic shocks,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conometrica* 81(5):2033–2053.
- Davis, D. R. & D. E. Weinstein(2008), “A search for multiple equilibria in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8(1):29–65.
- Dell, M. (2010),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Econometrica* 78(6):1863–1903.
- Doepke, M. & F. Zilibotti(2008),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747–793.
- Easterly, W. & R. Levine(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203–1250.
- Fernández, R. (2011), “Does culture matter?”, in: J. Benhabib & M. D. Jack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 North-Holland.
- Feyrer, J. & B. Sacerdote(2009), “Colonialism and modern income: Island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91(2):245–262.
- Galor, O. (2005), “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 in: P. Aghion & S. 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 Galor, O. (2007), “Multiple growth regimes: Insights from unified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9(3): 470–475.
- Galor, O. & D. N. Weil(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06–828.
- Galor, O. & O. Moav(2002),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133–1191.
- Galor, O. et al(2009), “Inequality in landownership, the emergence of human-capital promo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1):143–179.
- Gennaioli, N. & H. Voth(2009), “Malthusian dynamism and the rise of Europe: Make war, not lo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2):248–254.
- Giavazzi, F. et al(2013), “Attitudes, policies and work”,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6): 1256–1289.
- Gollin et al(2002),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160–164.
- Grossman, G. & E. Helpman(1991),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1):43–61.
- Guiso, L. et al(2003),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1): 225–282.
- Guiso, L. et al(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526–556.
- Hasen, G. D. & E. Prescott(2002),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4):1205–1217.

- Hayashi, F. & E. C. Prescott(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 Henrich, J. et al(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73-79.
- Hornbeck, R. (2010), "Barbed wire: Property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2):767-810.
- Hornbeck, R. (2012),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American dust bowl: Short- and long-run adjustments to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1477-1507.
- Iyer, L. (2010), "Direct versus indirect colonial rule in India: Long-term conseque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4):693-713.
- Jia, R. (2014), "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4):596-608.
- Jones, C. I. & D. Vollrath(2013),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 W. Norton & Co.
- Knack, S. & P. Zak(2001), "Trust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11(470):295-321.
- Kongsamut, P., S. Rebelo & D. Xie(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4):869-882.
- Landes, D. S. (2003),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3-22.
- Lin, J. Y.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3(2):269-292.
-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3-42.
- Lucas, R. E. (2000), "Some macro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1):159-168.
- Lucas, R. E. (2002),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in: R. E. Lucas,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ucas, R. E. (2009),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1-25.
- Michalopoulos, S. & E. Papaioannou(2014),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ub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1):151-213.
- Miguel, E. & G. Roland (2011),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1-15.
-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
- Nunn, N. (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1):139-176.
- Nunn, N. & N. Qian(2011),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2):593-650.
- Nunn, N. & L. Wantchekon(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3221-3252.
- Puga, D. & D. Treffer(2014),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d to glob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753-821.
- Redding, S. J. & D. M. Sturm(2008), "The costs of remoteness: Evidence from German division and reun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1766-1797.
- Redding, S. J. et al(2011),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airpor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3):814-831.
-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1002-1037.
-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s71-s102.
- Solow, R. (1956),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65-94.
- Squicciarini, M. P. & N. Voigtlander(2015),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4):1825-1883.
- Tabellini, G. (2010),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4):677-716.
- Voigtlander, N. & H. Voth(2013), "The three horsemen of riches: Plague,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774-811.

(责任编辑:李仁贵)